

周志文
著

The Tower of Memory

记忆之塔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记忆之塔

周志文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简体字版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之塔 / 周志文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4

ISBN 978-7-108-04340-5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

字 数 163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7.00元

自序

感谢三联出版这本《记忆之塔》。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我没有写序，现在大陆版要出了，看看情势，须要先说几句话。

这几年我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了四本小书，计《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与《家族合照》。《时光倒影》是读书札记式的短文，后面三本是我个人有回忆性质的书（我不喜欢用“回忆录”来形容，因为“回忆录”太正式了）。《同学少年》是写少年到青年这一阶段的往事，往事的发生地多在台湾东部的一处乡下，《记忆之塔》写的是到台北读大学之后到就业、深造，继之以在各地闯荡，过完了大半辈子的事；后面的一本《家族合照》则朝更内部探索，写些家庭之间与比家庭稍稍广一些的故事旧闻。

我的童年算起来比一般人辛苦，因为遭遇四九年的家国之变，其中免不了颠沛流离。到了台湾，也十分困难，乡下生活物质条件不足，精神条件也同样匮乏，但过了之后，回忆起来也还是忧喜参

半的，好像苦到尽处，自有不少甜味可享。这本《记忆之塔》写的是我从成长到年老，到今天虽“告老”而无家可“还”的窘状，其中所呈现台湾社会的面相比较多，又有愤疾之情，评语也较沉重。再后的一本《家族合照》，又回归家庭内外，做较内在的探索，这本书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较多，原不想出的，因缘巧合却出了。

现在谈这本《记忆之塔》，这本书写我二十岁之后的台湾经验，“纵深”大约有四十年，当然我尽量小心，不敢写远，但四十年来所历，也是充满了起伏波折。在我少年时，因为苦闷看了许多乡下小孩不该看的书，使我比一般小孩成熟，常思考游戏胡闹之外的事，书的内容往往左右了我之后的生命情调。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脑海埋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总是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合理的？碰到不合理应该用什么态度与方法解决？有这种问题埋在心中是绝对不幸的，此后的一生势必多灾多难了，因为这个现实世界，大多数的事，并不照你从古圣时贤所得知的理想来进行。

我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教育，一直到退休，都在学校待着。一般说在学校待着的人都比较平和，因为学校相对于其他团体，还是比较安定静止的，古人形容施教与受教，用“如沐春风”这成语是对的。但这本书中写的我一生的困顿与冲突，多是因教育而起，而且这种困顿与冲突到我老了还是不断。这岂不是我的一生都伤痕累累吗？是的，在内心，伤痕都在内心，外表倒看不大出。台湾社会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别人不顺眼，别人也同样看你不顺眼，而彼此相互容忍，也就相安无事，所以冲突很少闹到不可收拾，周围看起来还是天

高日暖的。藏在内心的冲突，有时正好作为艺术创作的泉源。

我不善交际，写了书很少与外界“沟通”，作家水晶说我没有名气，可能这也是原因。印刻出的四本书前两本在大陆已出，《时光倒影》由世纪文景出的，《同学少年》则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现在的这本《记忆之塔》由三联书店出，而后面一本《家族合照》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了。四本书分成四家出版社出版，据我朋友说更是“下下之策”，完全无法形成“气候”，这证明我不善经营，也没有进取之心。朋友的批评我敬谨接受，这是我的天性，也确实勉强不得，这四本书都是出版社闻讯后各自联络所成，我有点居于被动，心想这四本书就算放在一起也没什么“火力”可言，对朋友的责备也就释然了。

一本书对作者而言是个很小的事，但幕后所牵涉的工程还是大的，尤其有两岸问题横亘其中，著作权与出版的规则都不很相同，都需要先做折冲调和。等到书要校对了，才发现两岸的歧异还真不少，有许多观念不同，需要不断沟通才形成一个可被双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我脾气不好，有时会与出版社闹意见，幸好与我“对口”的编辑都是好性情的人，总是委婉的跟我解释说明，把原本存在的吊诡或矛盾（paradoxes）化为平行（parallels），书才可以出版。^①我不只庆幸这本书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在大陆出版，也因

^① 古兹利米安（Ara Guzelimian）编了一本书名叫《并行与吊诡》（*Parallels and Paradoxes*），记文学家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与音乐家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 1942—）几次有关音乐的对谈。本文所用二词不敢掠美，特注出处。

此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四本书分成四家不同出版社出版，我更广纳了“四方”的朋友），对一个不善交际的我而言，这个经验十分珍贵。

这本《记忆之塔》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作了很严格的批评，枪火四射，也可能伤及无辜。四九年之后，两岸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相往来，形成隔绝，但台湾文化来自中国大陆，我在批评台湾的时候，自然免不了把中国大陆带下水，言词也不见得不严厉。我从未想这本书有大陆版问世，以为大陆不可能让这样一本“伤害”台湾又“伤害”大陆的书出版的。幸好不是，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出版社都让它存真以示人，只动了很小的一部分。我跟编辑写信，说大陆社会益见成熟，许多几年前忌口的事，现在都能畅所欲言了，也许四五年之后再看到今天删节的部分已成了笑话。

两年前的2月这本书在印刻新出，我随即到珠海的一所学校教了一阵书，那所学校的一位大四的学生叫黄昉萁的，从网上买来读了，并写了篇文情并茂的读后感放在她的博客上，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周志文在一个疏离的角度用观察的目光一一扫过世间人群，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可也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们显得真实，让读者突然从这本书中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望见自己的人生与内心：谁没有那些一时膨胀或者追逐虚妄的时候呢，谁又能不曾经历过那些荒诞不经与苦涩得不能下咽的岁月就轻易成长呢！

.....

不读这本书，我不知道文字可以这样在最若无其事的平淡里蕴含了至深切的惊心动魄。

那苍劲的文字背后，是一位学人数十年来累积的思考与希冀；层层迭迭的回忆中，始终不变的是一份对世间众生的悲悯与赞叹。天光云影之下，无数宾客达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又有多少人会偶尔驻足，看看有没有什么是真正深远而绵长的存在呢？

她对这本书的形容，我有点担当不起，但这段话不只说出她的所感，也道出了我书中的某些内蕴，我就把它引在序文中。其他书内的文字自会表白，就不多说了。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暂居南港中

目 录

自 序	1
第三号交响曲	1
外 双 溪	13
孟 子	23
台 北	35
胡 适	45
存在主义	59
蒋经国的后人	71
关于罗素	83
战争进行中	95
范神父悲秋	105
桃园风景	117
初进台大	133
台大师长	147
五经博士	161

观音山	173
口渴	187
溪山行旅图	201
报业	211
教育	219
在我们的时代	231

跋 岁月沉沙

——读周志文的《记忆之塔》 / 张瑞芬 241

第三号交响曲

进了大学，我就像有翅在身，
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周游无限了。
这时候的我，
有点像写第三号交响曲时的贝多芬……

贝多芬在一八〇二年开始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很想写些与他第一号、第二号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在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就舍弃了温文儒雅的开场习惯，四分之三拍的节奏，第一个音就用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定音鼓大敲，节奏感极强的三个 f 强音，振聋发聩得让人精神一振，贝多芬写这曲子，就是打算要人精神一振。匈牙利籍指挥家 Ferenc Fricssay（1914—1963）有一次说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是写他自己从古典的束缚下寻求“解放式的新生”；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托斯卡尼尼说，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无疑还是个古典主义的人，而他在思想上寻求改变也是确切的。古典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可以求新求变的，这是托斯卡尼尼对古典的信仰。不论怎么说，贝多芬在第三号交响曲里，表现了与所有古典主义作曲家不同的一套，建立了他独特的艺术视野倒是真的。他是独创的、崭新的，管他的创新是属于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啊！音乐原来是王公贵族的娱

乐，是生活上的“伴奏”。在贝多芬之前，宫廷的音乐家穿着华服，头戴银色的假发，音乐跟其他一切的艺术一样，就算是音乐上的泰山北斗巴赫与神童莫扎特也都要臣服在主教与国王、郡主的麾下。主人要谈正事了，总管向乐师长使个眼色，乐师们只得一鞠躬，悄然退下。贝多芬想写些不同的，至少不能让人在演奏中随时叫停的作品。他在维也纳的声誉日隆，他想写出自己生命即将展开的前景，朦胧中的美丽，不安中的沉静，还有在未来可能俯拾即是的神奇收获。

那也正是整个欧洲沉醉在诗一样迷梦之中的时刻，一个来自科西嘉岛据说患有严重胃痛与便秘毛病的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正带领千疮百孔的法兰西走出迷雾的丛林。整个法兰西在他的鼓舞下脱胎换骨变得像少年一般，人人精神抖擞的跑向开阔的原野，涣散已久的三色旗又再次啪啪作响的飞扬在东升旭日的光辉中。贝多芬把这首交响曲取名叫《英雄》，一度打算题赠给拿破仑，但两年后等曲子写完要首演的时候，拿破仑终于暴露出侵略的野心，而且自己也想当皇帝了，贝多芬对他厌弃起来，就在原稿中把所题赠的名字抹掉。但这首交响曲大家都早已用《英雄》叫它，他不便更改，就继续叫它为《英雄》了。

叫这首交响曲为《英雄》是很合理的，它的乐句充满了高岸的理想。但这高岸的理想并不是天生就树立在那里的，它是经历了许多打击与挫折，从晦暗低沉甚至死亡的阴影中才逐渐找到的，所以《英雄交响曲》中充满了沉郁的甚至死亡的暗示，尤其在它标示着

Adagio Assai 的第二乐章中。所有生命与宗教上的启示其实是一种对比，天堂与地狱，罪恶与救赎，忧伤与欢乐，人常常在对比中体会到一些平常日子无法体会的东西，对比越是强烈，感触越是深刻。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

一九六一年，我从宜兰乡下的一所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我也跟着一些同学的“脚步”，到台北参加“大专联考”。当时台湾称得上大学的学校不多，所以这相当于现在大陆的“高考”，是大学（其中也包括了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联合招生，专科学校与大学录取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三十。当时考上了“联考”，一般会称呼他们为大专生，很少称他们为大学生的，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要修业四年、毕业后有方帽子戴，并且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比例上殊少，社会把进大学称作“挤大学的窄门”，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乡下人对大学或专科学校老是分不清。中国传统有时把受教育当成投资，则大专毕业手上拿到的一张毕业证书就常视为可以获利的凭证，很多人会谨慎的将它装上玻璃框，高挂在客厅的墙上，让看到的人人称羨。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次看见镇上的一户人家嫁女儿，当时嫁女儿讲究陪嫁品的阵仗，每一大件都分别用一辆人力车拖着，车子越多，越显得风光。我看到一部人力车上放着一口并不起眼的木箱，箱子上面用架子架起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放的是这位新娘在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服装设计科毕业的证书，一时

之间，这张证书仿佛使得整个送陪嫁品的队伍都显得活跃又气派起来。

报上发榜的榜单，上面登着我的名字，我被分发到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老实说我那年考试考得不好，而我们乡下的学生都不太会填志愿，我的志愿就填得很少，只填了中文系、美术系以及大概新闻系吧，总共六七个志愿，按理说是考不上的，但世事大部分不是由人来掌握。那年联招，数学考题出得极难，后来统计，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考了零分，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十分与二十分前后打转，我考了个五分，我与数学好的人差距原不止此数，但这次数学好的反而纷纷中箭落马，意外使得我得以“蒙”上大学。

与我同时“蒙”上大学的还有我同班好友李茂盛，他因数学考了近五十分，其他文科与社会科考得还不如我，竟然“高中”台大中文。同班还有个女同学，总分跟我相差不远，也分发到政大夜间部的中文系（当时不但是“大专”联招，甚至夜间部也参加联招的），我们一班考上大专的一共六人，三班毕业班总计有十余人上榜，这已经破了学校长年以来的纪录了，我们班上录取的六人中又有三人是读中文系，当年也算奇事一桩。

我的家庭状况特殊，我考上的私立大学，学费比一般公立大学要贵，我是根本无法筹到的。我父母早死，读中学之前，算是“寄居”在我二姐的家里，二姐又是军眷，自己在一个联勤单位担任雇员，收入有限，加上她连续生了五个孩子，家中食指浩繁，根本无力供应我升学所需。姐姐与我的关系一直算是很好的，否则她无须

供应我生活，但我在读高中时因为屡次拒绝入党，学校通知家长，我二姐夫与二姐就对我十分不满，一度使我们的关系紧张。姐夫是陆军中级军官，姐姐在军事机关供职，他们都是忠实又有党龄的党员，学校通知他们（当然不是正式的通知，是通知军训教官之类的口头告示）说我拒绝入党，他们一方面觉得很失面子，一方面对我的品德，至少在忠诚这一方面产生怀疑。我后来曾想过我为什么拒绝入党的事，其实也没有那么义正词严，读高中时我思想上叛逆得厉害，那是许多叛逆中的一小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只是不想跟人一样。还有，假如“吸收”我入党的是令我尊敬的嵯恩昶老师（字仲明，号梦庵），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嵯老师自己就不是党员。我曾婉言向我的姐姐、姐夫解释我的想法，我不认为我的忠诚要靠入党来完成，我曾经举例，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入过国民党，现在怎样了？但无论我说得如何有理，都不为他们接受，有一次他们还表示，我不入党，就请我离开，他们不愿再供给我的生活，甚至于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不知道（向他们的党或领袖）感恩的人，连高中也“无必要”读下去。

我当时应该毅然出走才对，高中时候我有几次想到出走的问题，而且也初步付诸“行动”过。我常到镇上的大东戏院看一位油画师画看板，他是镇上几家戏院看板画得最好的，因为常去看，他跟我就有点认识了。由于我会画几笔，常代表学校参加县里的各项美术比赛，也侥幸得过名次，他竟然知道。一次他表示需要助手，问我有没有兴趣，如果要去，随时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把这个

讯息放在心上，打算权衡情势再采取行动。后来我想，我那时如真的去做他的助手，几年后就应该能独当一面，也许我不满意只是做一个画戏院看板的工匠，其实我如继续努力，以后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了。

但这出走的盘算只在心中运作，并没能真正实践，主要的原因是看似姐姐家在支援我，而姐姐家其实也靠我支援。她的孩子还小，很多时候需要我帮她带，尤其最大的两个男孩，正在上国小会顽皮的年纪，她不太有闲，也不太管得住他们，这看孩子的事很多需要我，我要带孩子到澡堂去洗澡，还要带他们玩或做功课。再加上姐夫多数日子军旅在外，家里只我一个大男孩，一切粗重的、需要靠力气的工作都要由我来做。姐夫与姐姐曾不客气的叫我走，但考虑我真走了，家里马上缺少了人手，再加上邻居必定会闲言闲语，他们就隐忍着我不入党的“叛国”行为，不再表示要我滚蛋了。我则想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我高中毕业再想变动的事吧。

我考上了私立大学，二姐与姐夫自然不可能供应我求学之资，我其实还有另项选择。我在毕业前曾在教官的鼓励下与许多同学一同去报名考军校，当时考军校有多项优惠措施，报名费不用缴之外，军事单位还用军车来学校接送考生，真有些古人进京会试乘“公车”的味道。后来发榜，我竟然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一想黄埔军校就是陆军官校的前身，我如选择入校，就成了中国现当代许多名将的“学弟”了，不是也很神气吗？但随即想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成语，便很自然的意识到，将来自己到底会成为成语中的“一

将”还是“万骨”之一呢？就不怎么觉得有神气的必要了。

我一度想放弃大学的入学，先找个工作，再好好准备，明年也许可以考上公立学校，我特别为这事找我的老师嵇梦庵先生商量。嵇老师出身鲁南郯城世家，抗战时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是诗人也是书法家，我高二与高三时都由他教国文，高三时他还担任我们班的导师，他很关怀我也还器重我，所以如有重要事，我都会向他请教。老师根据个人的气质与“气象”，劝我还是选择文学校的好，他说当兵要从没有脑子训练出脑子来，对我这样天生有脑子的人很不适宜。至于文学校中的公立私立，其中当然有差，但苦心准备一年，明年重考，到时是否十拿九稳，还在未定之天，因为考学校这件事不完全靠实力，有时更靠机缘（我想我也没什么实力可言）。他劝我不如趁此机会早点走出这个小地方，到台北去见见世面，也许突破了一点之后，其余就不成为问题了。老师鼓励得很殷切，我答应试试。

东吴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寄来了，学费到底多少，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对当时的我而言，确实是个令人绝望的数目，但想不到突然有了转机。我有个同父同母的三姐（二姐与我是同母异父），她比我要大七岁，当时她在金门做心战播音员，负责每天对对岸“匪军”心战喊话。三姐是“国防部”心战总队的聘雇人员，根本不是军职，做这工作，纯粹是看上除了军人的待遇之外还有前线加给，比在台湾工作要收入丰厚些。她虽不是军人，但成天在前线碉堡生活，也就穿着军装，穿久了别人都把她当作军人看了，后来她自己